

南丰文钞引

1 曾子固之才焰，虽不如韩退之、柳子厚、欧阳永叔及苏氏父子兄弟，然其议论必本于六经，而其鼓铸剪裁，必折衷之于古作者之旨。朱晦庵尝称其文似刘向。向之文，于西京最为尔雅。此所谓可与知者言，难与俗人道也。近年晋江王道思、毗陵唐应德始亟称之，然学士间犹疑信者半，而至于脍炙者罕矣。

2 予录其疏札状六首，书十五首，序三十一首，记传二十八首，论议杂著哀词七首。嗟乎！曾之序记为最，而志铭稍不及，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，学者不可不知。

归安鹿门茅坤题

南丰文钞·目录

南丰文钞引

卷九十七 南丰文钞一 [疏] [札] [状]

熙宁转对疏..... (1)

移沧州过阙上殿疏..... (5)

议经费札子..... (11)

请减五路城堡札子..... (13)

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..... (15)

请令州县特举士札子..... (17)

卷九十八 南丰文钞二 [书]

上范资政书..... (21)

上欧阳学士第二书..... (23)

上蔡学士书..... (25)

上欧蔡书..... (27)

福州上执政书..... (30)

谢杜相公书..... (33)

卷九十九 南丰文钞三 [书]

上杜相公书..... (35)

与杜相公书..... (38)

与孙司封书..... (39)

与抚州知州书..... (41)

与王介甫第二书..... (42)

寄欧阳舍人书..... (44)

答范资政书..... (46)

答王深甫论扬雄书..... (47)

答孙都官书..... (50)

卷一百 南丰文钞四 [序]

《战国策》目录序..... (52)

《南齐书》目录序..... (54)

《梁书》目录序..... (56)

《陈书》目录序..... (58)

太祖皇帝总序..... (60)

《新序》目录序..... (64)

《列女传》目录序..... (66)

《说苑》目录序..... (68)

徐幹《中论》目录序..... (70)

卷一百一 南丰文钞五 [序]

《礼阁新仪》目录序..... (72)

《李白诗集》后序..... (74)

《范贯之奏议集》序..... (76)

《强几圣文集》序..... (78)

《王子直文集》序..... (79)

《王深父文集》序..... (80)

《王平甫文集》序..... (81)

《齐州杂诗》序..... (83)

先大夫集后序..... (84)

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..... (86)

《类要》序..... (88)

卷一百二 南丰文钞六 [序]

送傅向老令瑞安序..... (90)

送丁琰序..... (90)

送周屯田序..... (92)

送赵宏序..... (93)

送江任序..... (95)

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..... (96)

赠黎安二生序..... (98)

送蔡元振序..... (99)

叙盗..... (100)

序《越州鉴湖图》..... (101)

送李材叔知柳州序..... (106)

卷一百三 南丰文钞七 [记]

筠州学记..... (109)

宜黄县县学记..... (111)

瀛州兴造记..... (114)

繁昌县兴造记..... (115)

洪州新建县厅壁记..... (117)

齐州二堂记..... (119)

广德湖记..... (121)

襄州宜城县长渠记·····	(123)
卷一百四 南丰文钞八 [记]	
徐孺子祠堂记·····	(126)
阆州张侯庙记·····	(128)
抚州颜鲁公祠堂记·····	(129)
尹公亭记·····	(132)
墨池记·····	(133)
饮归亭记·····	(134)
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·····	(136)
归老桥记·····	(137)
越州赵公救灾记·····	(138)
卷一百五 南丰文钞九 [记] [传]	
清心亭记·····	(141)
醒心亭记·····	(142)
拟岘台记·····	(143)
道山亭记·····	(144)

学舍记·····	(146)
南轩记·····	(147)
鹅湖院佛殿记·····	(149)
仙都观三门记·····	(149)
分宁县云峰院记·····	(150)
菜园院佛殿记·····	(152)
洪渥传·····	(153)
卷一百六 南丰文钞十 [论] [议]	
[杂著]	
唐论·····	(155)
讲官议·····	(157)
公族议·····	(158)
为人后议·····	(160)
救灾议·····	(166)
书魏郑公传·····	(170)
苏明允哀辞·····	(172)

卷九十七 南丰文钞一 [疏] [札] [状]

熙宁转对疏[1]

茅坤评曰：“劝学二字，公之所见正，所志亦大，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，故不得见用于时。姑录而存之，以见公之概。”

1 准御史台告报臣寮朝辞日具转对[2]，臣愚浅薄，恐言不足采。然臣窃观唐太宗即位之初，延群臣与图天下之事，而能继封伦[3]，用魏郑公之说[4]，所以成贞观之治[5]。周世宗初即位[6]，亦延群臣，使陈当世之务，而能知王朴之可用[7]，故显德之政，亦独能变五代之因循。夫当众说之驰骋，而以独见之言，陈未形之得失，此听者之所难也。然二君能辨之于群众之中而用之，以收一时之效，此后世之士，所以常感知言之少，而颂二君之明也。今陛下始承天序，亦诏群臣，使以次对，然且将岁馀[8]，未闻取一人，得一言，岂当世固乏人，不足以当陛下之意与？抑所以延问者，特用累世之故事，而不必求其实欤？臣愚窃计殆进言者，未有以当陛下之意也。陛下明智大略，固将比迹于唐虞三代之盛，如太宗、世宗之所至，恐不足以望陛下，故臣之所言，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。伏惟陛下超然独观于世俗之表，详思臣言而择其中，则二君之明，岂足道于后世，而士之怀抱忠义者，岂复感知言之少乎？臣所言如左：

2 臣伏以陛下恭俭慈仁，有能承祖宗之德；聪明睿知，有能任天下之材。即位以来，早朝晏罢，广问兼听，有更制变俗、比迹唐虞之志，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。然而所遇之时，在天则有日食星变之异，在地则有震动陷裂、水泉涌溢之灾，在人则有饥馑流亡、讹言相惊之患，三者皆非常之变也。及从而察今之天下，则风俗日以薄恶，纪纲日以弛坏，百司庶务，一切文具而已[9]。内外之任，则不足于人材；公私之计，则不足于食货。近则不能不以盗贼为虑，远则不能不以夷狄为忧。海内智谋之士，常恐天下之势不得以久安也。以陛下之明，而所遇之时如此，陛下有更制变俗、比迹唐虞之志，则亦在正其本而已矣。《易》曰：正其本，万事理[10]。臣以谓正其本者，在陛下得之于心而已。

3 臣观《洪范》所以和同天人之际[1]，使之无间，而要其所以为始者，思也[12]；《大学》所以诚意正心修身[13]，治其国家天下，而要其所以为始者，致其知也。故臣以谓正其本者，在得之于心而已。得之于心者，其术非他，学焉而已矣。此致其知所以为大学之道也。古之圣人，舜禹成汤文武，未有不由学而成，而传说、周公之辅其君[14]，未尝不勉之以学。故孟子以谓学焉而后有为，则汤以王，齐桓公以霸[15]，皆不劳而能也，盖学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。诚能磨砢长养[16]，至于有以自得，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，未有不能尽也。能尽天下之理，则天下之事物接于我者，无以累其内；天下之以言语接于我者，无以蔽其外。夫然则循理而已矣，邪情之所不能入也；从善而已矣，邪说之所不能乱也。如是而用之以持久，资之以不息，则积其小者必至于大，积其微者必至于显。古之人自可欲之善，而充之至于不可知之神，自十五之学，而积之至于从心之不逾矩[17]，岂他道哉？由是而已矣。故曰：“念终始典于学。”[18]又曰：“学然后知不

足。”[19]孔子亦曰：“吾学不厌。”[20]盖如此者，孔子之不能已也。夫能使事物之接于我者不能累其内[21]，所以治内也；言语之接于我者不能蔽其外，所以应外也。有以治内，此所以成德化也；有以应外，此所以成法度也。德化法度既成，所以发育万物，而和同天人之际也。

4 自周衰以来，道术不明。为人君者，莫知学先生之道以明其心；为人臣者，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。一切苟简，溺于流俗末世之卑浅，以先王之道为迂远而难遵。人主虽有聪明敏达之质，而无磨礲长养之具，至于不能有以自得，则天下之事，在于理者有所不能尽也[22]。不能尽天下之理，则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，足以累其内；天下之以言语接于我者，足以蔽其外。夫然，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，欲从善而邪说足以乱之。如是，而用之以持久，则愈甚无补；行之以不息，则不能见效。其弊则至于邪情胜而正理灭，邪说长而正论消，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于乱者，以是而已矣。此周衰以来，人主之所以可传于后世者少也。可传于后世者，若汉之文帝、宣帝[23]，唐之太宗，皆可谓有美质矣。由其学不能远而所知者陋，故足以贤于近世之庸主矣，若夫议唐虞三代之盛德，则彼乌足以云乎？由其如此，故自周衰以来，千有馀年，天下之言理者，亦皆卑近浅陋，以趋世主之所便，而言先王之道者，皆绌而不省。故以孔子之圣，孟子之贤，而犹不遇也。

5 今去孔孟之时又远矣，臣之所言，乃周衰以来千有馀年，所谓迂远而难遵者也。然臣敢献之于陛下者，臣观先王之所已试，其言最近而非远，其用最要而非迂，故不敢不以告者，此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。伏惟陛下有自然之圣质，而渐渍于道义之日又不为不久，然臣以谓陛下有更制变俗、比迹唐虞之志，则在得之于心。得之于心，则在学焉而已者。臣愚以谓陛下宜观《洪范》、《大学》之所陈，知治道之所本不在于他；观传说、周公之所戒，知学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。陛下有更制变俗、比迹唐虞之志，则当恳诚惻怛，以讲明旧学而推广之，务当于道德之体要，不取乎口耳之小知，不急乎朝夕之近效，复之熟之，使圣心之所存，从容于自得之地，则万事之在于理者，未有不能尽也。能尽万事之理，则内不累于天下之物，外不累于天下之言。然后明先王之道而行之，邪情之所不能入也；合天下之正论而用之，邪说之所不能乱也。如是而用之以持久，资之以不息，则虽细必巨，虽微必显。以陛下之聪明，而充之以至于不可知之神；以陛下之睿知，而积之以至于从心所欲之不逾距，夫岂远哉？顾勉强如何耳。夫然，故内成德化，外成法度，以发育万物，而和同天人之际，甚易也。若夫移风俗之薄恶，振纪纲之弛坏，变百司庶务之文具，属天下之士使称其位[24]，理天下之财使贍其用，近者使之亲附，远者使之服从，海内之势使之常安，则惟陛下之所欲，何求而不得，何为而不成乎？未有若是而福应不臻，而变异不消者也。如圣心之所存，未及于此，内未能无秋毫之累，外未能无纤芥之蔽，则臣恐欲法先王之政，而智虑有所未审；欲用天下之智谋材谔之士，而议论有所未一，于国家天下愈甚无补，而风俗纲纪愈以衰坏也。非独如此，自古所以安危治乱之幾，未尝不出于此。

6 臣幸蒙降问，言天下之细务，而无益于得失之数者，非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。辄不自知其固陋，而敢言国家之大体。惟陛下审察而择其宜，天下幸甚。

【注释】

[1] 熙宁：宋神宗赵顼年号。 转对：据《宋史·礼志》说：熙宁初，“诏自今授外任者，许令转对论朝辞”。转对，指百官轮次奏事，言时政阙失。本文即在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，在曾巩通判越州以前所上的转对。 [2] 御史台：掌纠察的机构，其台主称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。 [3] 绌：犹言黜。 封伦：字德彝，以字行，渤海人。初仕隋，入唐，拜内史舍人，太宗时累拜尚书右仆射。 [4] 魏郑公：即魏徵，参见后《书魏郑公传》及其注 [1]。 [5] 贞观之治：贞观年间，唐太宗及其大臣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徵等以隋

亡为鉴，休养生息、发展经济、选拔人才，使经济得到发展，国力强盛，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 [6] 周世宗：五代时后周皇帝柴荣。他在显德元年（公元954年）继位后，整肃吏治，努力革除五代弊政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。 [7] 王朴：字文伯，东平（今属山东）人。进士出身。曾献《平边策》，深为周世宗器重，累官枢密使。 [8] 且将岁馀：熙宁初，下诏自今授外任者，许令转对。至熙宁二年，曾巩自求外任时，距下诏之日已将岁馀。 [9] 文具：犹“具文”，指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文。 [10] 正其本，万事理：今本《易经》中未见此引文，语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引。 [11] 《洪范》：《尚书》中的一篇，过去传为商末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“天地之大法”。 [12] 思也：《洪范》中有“思曰睿……睿作圣”之句。睿，同“叡”，明智、通达。 [13] 《大学》：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它提出了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等条目。 [14] 傅说（yuè）：商王武丁的辅佐。他出身微贱，武丁举以为相。与伊尹齐名。周公：指姬旦，周武王之弟。曾助武王灭商。武王死后，他辅助成王。 [15] 齐桓公：姓姜，名小白。齐襄公弟。在位时任用管仲进行改革，并“九合诸侯”，成为春秋时期的盟主。 [16] 磨砢：摩擦，这里喻锻炼、钻研。 [17] “自十五之学”二句：语本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子曰：‘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’”距，当作“矩”。后文“距”同。 [18] 念终始典于学：语见《书经·说命下》。这是傅说劝勉高宗武丁的话。 [19] 学然后知不足：语见《礼记·学记》。 [20] 吾学不厌：语见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” [21] 夫：原作“人”，今据集改。 [22] 茅坤于此处有批语云：“曾公凡到要紧话头便缩舌，岂能感动主上？及读王荆公万言书便别，学者须于此等去处看得玲珑，则它日立朝，必有做手。” [23] 文帝：指汉文帝刘恒。宣帝：指汉宣帝刘询。文、宣二帝在位时，都被称为治世。 [24] 属：集作“厉”。

【译文】

1 批准御史台上奏，回报臣下早朝辞朝的日子可以备办转对，我愚笨浅薄，恐怕说的话没有什么可以采纳的。然而我私自看到唐太宗即位的初期，延请群臣和他们商量天下的大事，而能够排除封伦，采纳魏徵的主张，所以成为“贞观之治”。周世宗开始即位，也延请众臣，让他们陈述当代该先做些什么，而能知道王朴的可以任用，所以显德时期的政治，也独能改变五代时的因循守旧。当众说纷纭的时候，能以独到见解的言论，陈述还没有形成的得失，这是听的人所难于分辨的。然而唐太宗、周世宗能在群众之中分辨出来而任用他们，因收到了一个时期的效果，这是后代的读书人，所以常常感觉到知言的人少，从而称颂唐太宗、周世宗的贤明了。如今陛下开始继承帝统，也下诏群臣，使按次转对，然而下诏以后已将近一年多，还没有听到取得一人，得到一言，难道当代本来就缺乏人才，不能够合陛下的心意吗？或者陛下的所以延请问答，只借用历代的旧事，而不一定求取它的实际呢？我愚笨私自考虑，恐怕进言的人，没有人能合于陛下的心意。陛下聪明智慧，雄才大略，本来将并列于唐尧、虞舜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兴盛，如唐太宗、周世宗所达到的，恐怕不足以期望陛下仅是这样，所以所说的，也不敢效法魏徵、王朴那样追求目标低下的近期效果。俯伏希望陛下能超脱世俗之见，别具只眼，详细思考我所说的而能选择适用处，那么，唐太宗、周世宗的圣明，在后世就不足道了，而读书人中怀抱忠义的人，难道还能感到知言的人少吗？我所要说的如下：

2 我以为陛下恭敬节俭、慈爱亲仁，有能继承祖宗的好品德；聪明智慧，有能担负天下的才能。即位以来，早早上朝，很晚才散朝，广泛地请教而兼听各方面的意见，有更改旧制、改变习俗，并迹唐尧、虞舜的志向，这不是众臣所能比得上的。然而所遇到的时代，在天上就有日食、星象的变异，在地上就有大地的震动和陷落、水泉从地下上涌的灾难，在百姓就有饥饿流亡、讹传相惊的祸患，这三方面都是非比寻常的灾变。再从而观察今日的天，风俗一天比一天淡薄邪恶，国家的法制一天比一天松懈败坏，百官的众多事务，一切都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文罢了。朝廷内外的任用官吏，就感到人才不足；公私的筹划，就感到食货不足。从近的方面来看，

就不能不忧虑盗贼；从远的方面来看，就不能不忧虑外族的入侵。海内有智有谋的人士，常常恐怕天下的形势不能长久安定。以陛下的圣明，而所遇到的时代却是这样，陛下有更改旧制、改变习俗，并迹唐尧、虞舜的志向，就也在于端正它的根本罢了。《易经》上说：端正它的根本，万事就治理好了。我认为所谓端正它的根本，就在陛下能从内心修养中得到。

3 我读《洪范》篇，所以能和同天人之间，使它没有间隙，而探求它以什么为开始的，就是思；《大学》所以讲诚意、正心、修身，治理国家、天下，而探求它以什么为开始的，是求得知识。所以我认为所谓端正它的根本，就在内心修养中得到罢了。从内心修养中得到，它的办法不是别的，就是学习罢了。这是求得知识所以为大学之道了。古代的圣人，虞舜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，没有不从学习开始而取得成功的，而傅说、周公的辅助他们的君主，没有不用学习来勉励他们。所以孟子认为学了然后才能有所作为，商汤学了成王，齐桓公学了成霸，都不必操劳而能成功，学习能促成君主的功德竟到这样地步。果真能够在学习上磨炼，长期培养，直到心有所得，那么，天下的事情合于理的，没有不能穷尽的。能穷尽天下的理，那么，天下接触我的外在事物，不能影响我的内心；天下用言语劝说我的，不受他外表的蒙蔽。能做到这样，就是顺应着理罢了，邪恶的事情不能侵入了；跟随着善罢了，邪恶的言辞不能造成混乱了。如果这样，长期地坚持下去，不停地支持下去，那么，积累微小的一定能到巨大，积累幽隐的一定能到明显。古代的人从可以想到的善，而扩充到不能知道的神，从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习，而积累到七十岁的任凭心里所想，也不超越规矩，这难道有别的道路吗？就是由于坚持学习罢了。所以说：“始终想念的，常在学习上。”又说：“学习了，然后知道自己知识的不够。”孔子也说：“我学习不感到厌倦。”能做到这样，连孔子也不能终止学习。能使接触我的事物，不能影响我的内心，所以能控制内心；用言辞劝说我的，不受他的外表所蒙蔽，所以能应付外界。有用来控制内心的，这所以成为道德的感化；有用来应付外界的，这所以成为法度。道德的感化和法度已经成功，所以能够化育万物，而能和同天人之间了。

4 从周代衰微以来，治道的方法不清楚了。作为君主的，不知道学习先王的治道来使他的心里清楚；作为臣下的，不知道引导他的君主到达先王的治道。一切苟且简略，沉溺于世俗末代的卑下浅近，以为先王的治道是迂曲遥远而难于遵从。君主虽然有聪明、敏捷而通达事理的本质，而没有磨炼他、长期培养他的完备设施，甚至于不能有自得之见，那么，天下的事情，合于理的有所不能穷尽了。不能穷尽天下的理，那么，天下接触我的外在事物，足以影响我的内心；天下用言辞劝说我的，足以受他的外表所蒙蔽。如果这样，所以想要顺应着理，邪恶的事情足以侵害他了，想要跟随着善，邪恶的言辞足以造成混乱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长期坚持使用下去，就更加无补于事；不停地实行下去，就不能见到功效。它的蔽害就要到邪情胜利而正理灭亡，邪说增长而正论消亡，天下的所以不能治理而有到达动乱的，就因为这样罢了。这是周代衰微以来，君主的名声能流传到后代的少了。可以流传到后代的，像汉代的文帝、宣帝，唐代的太宗，都可说有美好的品质了。由于他们所学的不能远追古代，所知的浅陋，所以他们足以比近代的庸主贤德，倘若说起唐尧、虞舜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盛大的德行来，那么，他们何足以说呢？由于这样，所以从周代衰微以来，一千多年，天下说治理的人，也都是一些低下浅近的简陋办法，用来趋奉当代君主感到方便实行，而说先王治道的人的言论，都排斥而不看。所以像孔子的圣，孟子的贤，还不遇于时了。

5 如今离开孔子、孟子的时代又远了，我所说的，乃是周代衰微以来一千多年中，被称为迂曲遥远而难于遵照执行的。然而我敢于献给陛下的原因，我看先王已经试行过的办法，这些言论最为近理而不是遥远，它的用途最为简要而不是迂曲，所以不敢不上告的原因，在于我用以侍

奉陛下之区的志愿了。恳切的思念陛下有天然的圣明的姿质，而浸润于道义的日子又不能说不长，然而我认为陛下有更改旧制、转变习俗，并迹唐尧、虞舜的志向，就在得之于内心。得之于内心，就在学习罢了。我的愚见，认为陛下应当看看《洪范》、《大学》中所陈说的，知道国家治理的办法的根本不在别的地方，就在于学习；看看传说、周公所告诫的，知道学习不是明主所应该停止的。陛下有更改旧制、转变习俗，并迹唐尧、虞舜的志向，就应当恳切地感到忧伤，以讲明旧学而推广它，务必让它合于道德的精要，不采取浅近的小知，不急于追求一朝一夕的近效，反复熟记它，使圣上心里所存的，达到从容自得的地步，那么，万事的合于理的，没有不能穷尽的。能穷尽万事的理，那么，内心不受到天下万物的影响，外界不受到天下各种言论的影响。然后明了先王的治道而实行它，邪恶的事情就不能侵入了；集合天下的正论而使用它，邪恶的言辞就不能扰乱了。像这样长久坚持下去，不停地支持下去，那么，虽然是微小的，一定能达到巨大；虽然是幽隐的，一定能达到明显。以陛下的聪明，而扩充到不可知的神；以陛下的智慧，而积累到任凭心里所想，也不超越规矩，难道还会远吗？看您尽力去做得怎样了。能够这样，所以在内成为道德的教化，在外成为法度，用来化育万物，而和同天人之间，也很容易了。若要转变风俗的淡薄邪恶，振作法纪的松懈败坏，改变百官众务的空文，劝勉天下的士大夫使各称其位，治理天下的财政使它能够足用，近的地方能使他们亲近归附，远的地方使他们能够服从，国家的形势能使它常常安定，那么，只要陛下所想得到的，求取什么而不能得到，做什么而能不成功呢？没有这样而福运能不到，而灾变能不消失的。如果圣上的心里所存想的，没有达到这地步，内心不能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拖累，外界不能没有受到细微的蒙蔽，那么，我恐怕陛下想效法先王的政治，而智谋有所不详悉；想用天下的才智之士，而议论有所不一致，对于国家天下更加无补，而风俗法纪更加衰败了。非但这样，自古以来安危、治乱的隐微之处，没有不出于此的。

6 我幸蒙陛下下问，说天下的小事，对于国家得失的命运无益的，不是我所奉事陛下小小的志向。总是不知自己固塞鄙陋，而敢说国家的大要。只有请陛下审察而选择它合适的地方，天下就很幸运了。

移沧州过阙上殿疏[1]

茅坤评曰：“曾公此札，欲附古作者雅颂之旨，陈上功德，宣之金石，而其结束归于劝戒。”

1 臣闻基厚者势崇，力大者任重，故功德之殊，垂光锡祚，舄奕繁衍[2]，久而弥昌者，盖天人之理，必至之符。然生民以来，能济登兹者，未有如大宋之隆也。

2 夫禹之绩大矣，而其孙太康，乃坠厥绪[3]。汤之烈盛矣，而其孙太甲，既立不明[4]。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[5]，而大统未集，武王、成王始收太平之功[6]，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[7]，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[8]，暨于幽厉[9]，陵夷尽矣。及秦，以累世之智并天下，然二世而亡。汉定其乱，而诸吕、七国之祸[10]，相寻以起，建武中兴[11]，然冲质以后，世故多矣。魏之患，天下为三。晋、宋之患，天下为南北。隋文始一海内，然传子而失。唐之治在于贞观、开元之际[12]，而女祸世出[13]，天宝以还，纲纪微矣。至于五代，盖五十有六年，而更八姓[14]，十有四君，其废兴之故甚矣。

3 宋兴，太祖皇帝为民去大残[15]，致更生，兵不再试，而粤蜀吴楚五国之君[16]，生致阙下，九州来同，复禹之迹。内辑师旅，而齐以节制；外卑藩服[17]，而纳以绳墨。所以安百姓，御四夷，纲理万事之具，虽创始经营，而弥纶已悉。莫贵于为天子，莫富于有天下。而舍子传弟[18]，为万世策，造邦受命之勤，为帝太祖，功未有高焉者也。

4 太宗皇帝遁求厥宁[19]，既定晋疆[20]，钱俶自归[21]，作则垂宪，克绍克类，保世靖民，丕丕之烈，为帝太宗，德未有高焉者也。

5 真宗皇帝继统遵业[22]，以涵煦生养，蕃息齐民，以并容遍覆，扰服异类[23]。盖自天宝之末，宇内板荡[24]，及真人出[25]，天下平，而西北之虏，犹间入闕边[26]，至于景德二百五十余年[27]，契丹始讲和好，德明亦受约束[28]，而天下销锋灌燧，无鸡鸣犬吠之惊，以迄于今。故于是时，遂封泰山，禅社首[29]，荐告功德，以明示万世不祧之庙[30]，所以为帝真宗。

6 仁宗皇帝宽仁兹恕[31]，虚心纳谏，慎注措，谨规矩，早朝晏退，无一日之懈。在位日久，明于群臣之贤不肖忠邪，选用政事之臣，委任责成。然公听并观，以周知其情伪，其用舍之际，一稽于众，故任事者亦皆警惧，否辄罢免，世以谓得驭臣之体。春秋未高，援立有德，传付惟允，故传天下之日，不陈一兵，不宿一士，以戒非常，而上下晏然，殆古所未有。其岂弟之行[32]，足以附众者，非家施而人悦之也。积之以诚心，民皆有父之尊，有母之亲，故弃群臣之日，天下闻之，路祭巷哭，人人感动歔歔。其得人之深，未有知其所由然者，故皇祖之庙，为帝仁宗。

7 英宗皇帝聪明睿知[33]，言动以礼，上帝眷相，大命所集，而称疾逊避[34]，至于累月。自践东朝[35]，渊默恭慎，无所言议施为，而天下传颂称说，德号彰闻。及正南面，勤劳庶政，每延见三事[36]，省决万机，必咨询旧章，考求古义，闻者惕然，皆知其志在有为。虽早遗天下，成功盛烈，未及宣究，而明识大略，足以克配前人之休，故皇考之庙，为帝英宗。

8 陛下神圣文武[37]，可谓有不世出之姿；仁孝恭俭，可谓有君人之大德。悯自晚周、秦汉以来，世主率皆不能独见于众人之表，其政治所出，大抵踵袭卑近，因于世俗而已。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，修列先王法度之政，为其任在己，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。变易因循，号令必信，使海内观听，莫不奋起，群下遵职，以后为羞，可谓有能行之效。今斟酌损益，革弊兴坏，制作法度之事，日以大备，非因陋就寡，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。继一祖四宗之绪[38]，推而大之，可谓至矣。

9 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，刑与赋役之政暴也。宋兴以来，所用者鞭朴之刑，然犹详审反复，至于缓故纵之诛，重误入之辟，盖未尝用一暴刑也；田或二十而税一，然岁时省察，数议宽减之宜，下蠲除之令，盖未尝加一暴赋也；民或老死不知力役[39]，然犹忧怜惻怛，常谨复除之科，急擅兴之禁，盖未尝兴一暴役也。所以附民者如此。前世或失其操柄者，天下之势或在于外戚，或在于近习[40]，或在于大臣。宋兴以来，戚里宦臣，曰将曰相，未尝得以擅事也。所以谨其操柄者如此。而况辑师旅于内，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；卑藩服于外，天下不得专尺土一民之力。其自处之势如此。至于畏天事神，仁民爱物之际，未尝有须臾懈也。其忧劳者又如此。盖不能附其民，而至于失其操柄，又怠且忽，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乱也。民附于下，操柄谨于上，处势甚便，而加之以忧劳，此今之所以治安也[41]。故人主之尊，意谕色授，而六服震动[42]；言传号渙，而万里奔走。山岩窟穴之民，不待期会，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，惟恐在后；航浮索引之国[43]，非有发召，而羸賫橐负以致其贄者[44]，惟恐不及。西北之戎，投弓纵马，相与衽服而戏豫[45]；东南之夷，正冠束衽，相与挟册而吟诵。至于六府顺叙[46]，百嘉鬯遂[47]，凡在天地之内，含气之属，皆裕如也。盖远莫懿于三代，近莫盛于汉唐，然或三四世，或一二世，而天下之

变不可胜道也，岂有若今五世六圣[48]，百有二十余年，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，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，无援枹击柝之戒接于其耳目[49]。臣故曰生民以来，未有如大宋之隆也。

10 窃观于《诗》，其在《风》、《雅》，陈太王、王季、文王致王迹之所由[50]，与武王之所以继代[51]。而成王之兴[52]，则美有《假乐》、《鳧鷖》[53]，戒有《公刘》、《洞酌》[54]。其所言者，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，师旅祭祀饮尸受福[55]，委曲之常务。至于《兔置》之武夫[56]，行修于隐；牛羊之牧人[57]，爱及微物，无不称纪。所以论功德者，由小以及大，其详如此。后嗣所以昭先人之功，当世之臣子所以归美其上，非徒荐告鬼神、觉寤黎庶而已也。《书》称劝之以《九歌》俾勿坏[58]，盖歌其善者，所以兴其向慕兴起之意，防其怠废难久之情，养之于听而成之于心。其于劝帝者之功美，昭法戒于将来，圣人之所以列之于经，垂为世教也。

11 今大宋祖宗，兴造功业，犹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陛下承之以德，犹武王、成王。而群臣之于考次论撰，列之简册，被之金石，以通神明，昭法戒者[59]，阙而不图，此学士大夫之过也。盖周之德盛于文武，而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作皆在成王之世。今以时考之，则祖宗神灵固有待于陛下。臣诚不自揆，辄冒言其大体。至于寻类取称，本隐以之显，使莫不究悉，则今文学之臣，充于列位，惟陛下之所使。至若周之积仁累善，至成王、周公为最盛之时，而《洞酌》言皇天亲有德、飨有道，所以为成王之戒。盖履极盛之势，而动之以戒惧者，明之至，智之尽也。如此者，非周独然，唐虞至治之极也，其君臣相饬曰：“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。”[60]则处至治之极，而保之以祗慎，唐虞之所同也。今陛下履祖宗之基，广太平之祚，而世世治安，三代所不及。则宋兴以来，全盛之时实在今日。陛下仰探皇天所以亲有德、飨有道之意，而奉之以寅畏[61]，俯念一日二日万几之不可以不察，而处之以兢兢，使休光美实，日新岁益，闳远崇侈，循之无穷，至千万世永有法则，此陛下之素所蓄积。臣愚区区爱君之心，诚不自揆，欲以庶几诗人之义也，惟陛下之所择。

【注释】

[1] 沧州：今河北沧州市。疏：集作“札子”。曾巩于元丰三年（公元1080年）奉命移知沧州，上了一道《授沧州乞朝见状》，请求神宗召见。这道札子就是被允许朝见时上的。 [2] 舄（xì）奕：连绵不断的样子。

[3] “夫禹之绩”三句：夏禹治水，功绩极大。而其孙子太康，安享游乐田猎，不恤民事，因而被逐失国。

绪：前人未竟的功业。 [4] 既立不明：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帝太甲既立三年，不明，暴虐，不遵汤法，乱德，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。” [5] 后稷：名弃，周的始祖，十五传而至文王姬昌。 [6] 武王：姬发，灭殷纣，为周王朝开国之主。 成王：姬发子，名诵。史称“成、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错四十余年不用”。

[7] 康王：成王子，名钊，由召公、毕公辅政。 昭王：康王子，名瑕。 难于南狩：《帝王世纪》说：“昭王德衰，南征，济于汉，船人恶之，以胶船进王，王御船至中流，胶液船解，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。”

[8] 穆王：昭王子，名满。他征犬戎，“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。 荒服：古代王畿以外，每五百里为一区划，分别称为侯服、甸服、绥服、要服、荒服五等。服，指服事天子。荒服距王畿最远，为戎狄之地。 [9] 幽厉：指周幽王宫涅，为犬戎所杀；周厉王胡，为民所逐。 [10] 诸吕：指吕后的戚属，如吕产、吕禄等。吕后死后，他们谋夺刘氏天下，为周勃等诛灭。 七国：指汉景帝时的吴、楚七国之乱。吴王刘濞勾结楚、赵、胶西、济南、菑川、胶东六国，以“请诛晁错，以清君侧”为名，起兵叛乱，为周亚夫讨平。 [11] 建武中兴：指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。建武为光武帝年号。 [12] 贞观、开元：分别为唐太宗李世民及唐玄宗李隆基年号。 [13] 女祸世出：指武后、韦后及杨贵妃等。 [14] 更八姓：后梁太祖朱全忠，一姓；后唐庄宗李存勖，二姓；明宗为庄宗养子，本胡人，三姓；潞王为明宗养子，姓王，四姓；后晋石敬瑭，五姓；后汉刘知远，六姓；后周太祖郭威，七姓；世宗柴荣，为郭威养子，八姓。

[15] 太祖皇帝：指宋太祖赵匡胤。 [16] 粤：指南汉，据今广州。 蜀：指后蜀，据今成都。 吴楚：十国中的吴、楚，为南唐所灭，南唐又为宋所灭。故这里的吴、楚，当指吴、楚、南唐三国。凡五国。

[17] 外卑藩服：指宋太祖杯酒释石守信等兵权事。 [18] 舍子传弟：杜太后曾遗命立长，故太祖不传子德昭，而传位于弟匡义。 [19] 太宗皇帝：指宋太宗赵匡义，太祖之弟。 遘：发语词。 [20] 晋疆：指北汉。刘旻据太原，传至继元，降宋。因北汉据太原而称“晋疆”。 [21] 钱俶：吴越王钱缪孙，至太宗三年（公元978年），纳土归宋。 [22] 真宗皇帝：指宋真宗赵恒。 [23] 扰：顺。 异类：过去对少数民族的蔑称，这里指契丹。 [24] 板荡：《诗经·大雅》中有《板》、《荡》二诗，刺周厉王无道，败坏国家。后因以板荡指社会动荡不安。 [25] 真人：指帝王，这里指宋太祖赵匡胤。 [26] 闚：同“窥”。 [27] 景德：宋真宗第二个年号。 二百五十余年：指天宝末至景德元年，与契丹订“澶渊之盟”，和议成。凡二百五十余年。 [28] 德明：指李德明，西夏国主。景德元年即位。二年，受父李继迁嘱，派使臣奉表于宋。在位期间，与宋保持友好关系。 [29] 封泰山，禪社首：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典礼。在泰山筑台祭天，报天之功，称封；在泰山下梁父山辟场祭地，报地之功，称禪。历代帝王都把封禪作为国家大典。或禪于社首山，其地在今山东泰安市西南。 [30] 不祧：古代宗法立庙祭祖，因世数过远而迁庙叫“祧”，只有始祖庙永不迁徙，就叫“不祧”。 [31] 仁宗皇帝：指宋仁宗赵祯。 [32] 岂弟：同“恺悌”，和乐平易。 [33] 英宗皇帝：指宋英宗赵曙。 [34] 称疾逊避：英宗为仁宗养子，闻立他为皇子时，“称疾，益坚辞”。 [35] 东朝：太子居东宫，故称东朝。 [36] 三事：大夫。这里指三省大臣。 [37] 陛下：指宋神宗赵顼。 [38] 一祖四宗：一祖指太祖。四宗指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。 绪：功业。 [39] 役：集作“政”。 [40] 近习：皇帝亲幸的人，这里指宦官。 [41] 治安：集校作“治且安”。 [42] 六服：周代把王畿周围的地方，根据远近分为侯服、甸服、男服、采服、卫服、蛮服，称为“六服”。这里泛指各地。 [43] 航浮：靠船运载。 索引：因路艰险，要靠绳索牵引才能行走。 [44] 簠（yíng）：箱笼一类的盛物竹器。 橐（tuó）：盛物的袋子。 [45] 袞（xuàn）服：盛服。 [46] 六府：指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。 [47] 百嘉：这里指百穀。 鬯遂：畅茂顺遂。鬯，通“畅”。 [48] 五世六圣：自宋太祖至神宗六个皇帝中，太祖与太宗是兄弟，属同一代人，故称“五世六圣”。 [49] 援枹（fú）：手持击鼓棒，这里指击鼓警众。 击柝：谓夜间击柝警盗。 [50] 太王：即姬亶父，一称古公亶父。周文王的祖父。《诗经》中记载他事迹的有《大雅·绵》。 王季：即季历，周太王少子，文王之父。《诗经》中记载他事迹的有《大雅·大明》等。 文王：指周文王姬昌，周武王之父。《诗经》中记载他事迹的有《大雅》中的《大明》、《文王》、《皇矣》等篇。 [51] 武王之所以继代：见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《大明》、《文王有声》等篇。武王的“王”字原无，今据集补。 [52] 成王：周成王姬诵，周武王之子。“王”字亦据集增补。 [53] 《假乐》、《鳧鷖》：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二篇，诗序说它们是歌颂成王的诗。 [54] 《公刘》、《洞酌》：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二篇，诗序说它们是戒成王的诗。 [55] 尸：古代祭祀时，代死者受祭，象征死者神灵的人。 [56] 《兔置（jiē）》之武夫：《兔置》为《诗经·周南》篇名，诗中有“赳赳武夫”之句。 [57] 牛羊之牧人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。 [58] 劝之以《九歌》俾勿坏：语见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传曰：“歌以劝之，使政勿坏。” [59] 法戒：集作“法式”。 [60] “兢兢业业”二句：见《尚书·皋陶谟》。 [61] 以：原无，今据集校增补。 寅畏：恭敬、戒惧。

【译文】

1 我听说地基厚的气势就高，力气大的负载就重，所以有特殊功德的人，上天俯垂光芒赐给他皇位，连绵不断地繁衍生息，时间越久而更加昌盛，大概这是天人之间的道理，一定要到达的符信。然而从有人民以来，能成功地登上这的，没有能像大宋那样的兴隆。

2 夏禹的功绩大了，而他的孙子太康，却失去了他的功业。商汤的功业盛大了，而他的孙子太甲，继位以后不明，而被放逐。周从后稷开始，传了十五代而到文王，而还没有完成一统的大业，到了武王、成王，才收到天下太平的功业，而康王的儿子昭王，又在南巡中遇难，昭王的儿子穆王，又使最远的少数民族懈怠不朝，及至幽王、厉王，国势衰颓尽了。到秦代，用几代人的智慧兼并了天下，然而到二世就灭亡了。汉代平定了秦末的战乱，而又有诸吕、七国之祸，连续不断地起来，中间经光武中兴，然而到冲帝、质帝以后，世上的事故就多了。魏国的患难，在

于天下分为三。晋代、宋代的患难，在于天下分为南北朝。隋文帝始统一海内，然而传到儿子就灭亡了。唐代的盛世在于贞观、开元之间，然而女祸世代出现，天宝以后，法纪衰微了。到了五代，五十六年间，改了八个姓，换了十四个皇帝，它灭亡兴国的变故太快了。

3 宋代兴起，太祖皇帝为人民除去了大害，达到了与民更生，兵不再用，而粤、蜀、吴、楚、南唐五国的君主，活着送到朝廷，九州的人来相聚，恢复了夏禹统一天下的旧迹。内部使军队和睦，而加以统一的节制；外部削弱藩镇，从而纳入法制。所以能使百姓安宁，防备四方少数民族的入侵，总理万事的完备，虽然是开创经营，而统摄已经详悉。没有比做天子再尊贵的了，没有比有天下再富有的了。然而太祖舍弃儿子而把皇位传给弟弟，为了万世基业的考虑，立国受命的勤劳，成为太祖皇帝，功劳没有比他再高的了。

4 太宗皇帝为求得天下的安宁，已经平定北汉后，吴越王钱俶自己来归顺，所作法则流传下来，能继承又能做榜样，保卫国家，安定百姓，功业盛大，成为太宗皇帝，德行没有比他再高的了。

5 真宗皇帝继承帝统，遵守王业，以滋润化育人口生长，蕃延平民，用兼容遍覆的办法，使契丹顺服。从唐代天宝末年开，国内动荡不安，等到太祖出来，国家才平安，而西北的强敌，还不间断地窥伺边境，到景德时已过了二百五十多年，契丹才与我讲求和好，西夏国主李德明也受到我的约束，从而销毁天下兵刃，灌灭烽火，没有鸡鸣狗叫的惊恐，一直到今天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就在泰山、社首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，进告天地，功德完成，用来明示，成为万世不迁移的祖庙，所以成为真宗皇帝。

6 仁宗皇帝宽和仁厚、慈祥宽恕，虚心听从臣下进谏，办事谨慎，遵守法纪，上朝早，退朝晚，没有一日懈怠。在位的时间长，明白众臣中贤德的人和不肖的人，忠贞的人和邪恶的人，选用治政的大臣，委以重任，责其成功。然而他也能公开地听取意见并实际观察，因而能详细知道他们的真伪，他在任用和不任用之间，都查考众人对他的态度，所以担任职事的人，也都警惕戒惧，否则总是被罢官免职，世人认为得到驾驭臣下的要领。仁宗年岁不大，因品德好而被引立，传位给他是很合适的，所以把天下传位给他的日子，不陈列一兵，不宿卫一士，来警戒非常之变，而上上下下都很平静，恐怕是古来所没有过的。他和乐平易的品德，足以使众人归附，不是因家家施舍而人们才高兴的。积久而成的真诚心意，人民对他都有父亲般的尊敬，有母亲般的亲近，所以当仁宗抛弃群臣的日子，天下的人听到了，沿路祭祀，巷中哭泣，人人感动叹息。他的深得人心，没有知道他所以然的。所以皇上祖父的庙，被称为仁宗皇帝。

7 英宗皇帝聪明智慧，一言一行都符合于礼，上帝眷念相顾，天命所归，而他还称病退让，一直过了几个月。自从践位东宫，深沉静默，恭敬谨慎，没有议论政事并付诸实践，而天下传颂赞美，德行好的名声显扬在外。等到南面称帝，勤劳众政，每次延请接见三省大臣，审核决定各种政事，一定要询问过去的章程，考求古代合适的办法，听到的人都敬畏起来，都知道他志向在有所作为。虽然过早地遗弃天下，成功的盛大功绩，还没有来得及发扬光大，而他明察的识见，远大的谋略，足以能够匹配前人的美德，所以皇上父亲的庙，被称为英宗皇帝。

8 陛下既神且圣，才兼文王、武王，可说有不是每代都能出现的姿质；仁爱孝顺、恭敬节俭，可说有君主的大德。怜悯从晚周、秦汉以来，世上的君主都不能在众人以外有独特的见解，他们所施行的政治，大都沿袭了低下浅近，因而和同于世俗罢了。于是愤愤然以上追唐尧、虞舜、三代已经荒废断绝的政迹，整治先王的政治法度，来作为自己的责任，可说有超出几千年的大志。或变更，或沿袭，号令一定讲信用，使海内看到听到的人，无不奋起，在下位的众人遵守职责，把走在后面作为耻辱，可说有能够实行的效果。如今对旧政斟酌着减少或增加，革除弊

端，兴起被破坏了的，制订法度的事情，一天比一天大备了，不是因陋就简，受到常见掣肘的时代所能赶得上的。皇上继承了一祖四宗的功业，推广而扩大了它，可说到了顶点了。

9 大概前代或者不能使他的人民归附的，是刑法和赋税徭役的暴虐。宋代兴起以来，所用的是鞭打的薄刑，然而还要详细反复审查，直到缓和故意放纵的罪，重视误入歧途的刑法，大概没有用过一次暴刑；田赋或者二十而税一，然而一年四季还要实际视察，几次议论宽减到合适的程度，下免除赋税的命令，大概没有用上一次暴征的赋税；人民或者到老死还不知道什么是力役，然而还可怜百姓而忧伤，常谨慎地实行免除徭役的科条，急于实行擅自兴办徭役的禁令，大概没有兴起一桩残暴的劳役。宋代所用来使民归附的办法就是这样。前代的帝王有失掉权柄的，天下的权力或者操纵在外戚手里，或者操纵在宦官手里，或者操纵在大臣手里。宋代兴起以来，外戚、宦官、将相，没有能够擅权兴事的。帝王谨慎地操持他权柄的办法就是这样。何况在内部使军队和睦，天下不得私自动用一兵一卒；外部削弱藩镇，天下不得专用一尺土地、一个人民的力量。帝王自己所处的形势又是这样。至于畏惧上天、敬事神灵，仁爱百姓、爱护万物之间，没有一会儿懈怠。帝王的忧苦劳心又是这样。大概不能使人民归附，而到失掉权柄，又懈怠而且疏忽，这是前代的所以危险而且动乱的原因。人民归附在下，权柄慎于使用在上，所处的形势很便利，再加上忧苦劳心，这是今天的所以得到治平而且安宁的原因。所以人君的尊贵，自己不用开口，只用流露的情态，或脸色授意，就能使全国各地震动；用言语传达，或用号令发布，而能使人们万里奔走。住在山岩洞穴的人民，不等待约定相会的日期，而按季按年输送以供奉他职事的，只恐怕走在别人的后面；靠船运载，靠绳索牵引才能行走的国家，不是有征召，而装在筐里或装在袋子里背着以送他的进见礼物的，只恐怕赶不上。西北的戎人，丢弃了弓箭，解开了马匹，互相穿着盛装，安逸地戏乐；东南的夷人，戴正了帽子，束起了衣襟，相互挟着书册而吟诵。至于六府顺着次序运行，百谷畅顺，凡在天地以内的，有气息的种类，都能富足。远的没有比三代更美，近的没有比汉唐更盛，然而他们或者三四代，或者一二代，而天下的变故说不胜说了，岂能有像今天那样经过五世六位圣君，一百二十多年，自通都大邑到荒远的角落和海边聚居的地方，没有变容动色的忧虑萌发在他们心中，没有击鼓之警和击柝之戒接近他们的耳目。我所以说，从有人民以来，没有像大宋这样兴隆的。

10 私自观察《诗经》，它在《风》、《雅》中，陈述太王、王季、文王达到帝王足迹所经历的过程，和武王的所以能继代的原因。而成王的兴起，赞美的有《假乐》、《鳧鷖》，告诫的有《公刘》、《洞酌》等篇目。诗中所说的，大概都是些农夫、妇女、筑室、治田，军旅、祭祀、饮神、受福，曲曲折折的平常事务。至于像《兔置》篇中的武夫，行为修养在隐藏；《无羊》中放牧牛羊的牧人，爱及微小的生物，无不被称赞记载下来。他们用来评论功德的，由小到大，它的详细达到这样。后世的嗣君所以显扬先人的功德，当代的臣子所以把赞美归结到君主身上，不但为了进告鬼神，使黎民百姓觉悟罢了。《尚书》中称劝以《九歌》，使政治勿坏，大概是歌唱他的善行，用来激励他向慕而振兴的意思，防止他懈怠荒废难于持久的心情，培养他听到了歌声而能完成于内心的修养。它对于劝勉帝王的成功之美，显示法式鉴戒于将来的人，圣人所以把它列到经中，使它流传为世代的教育。

11 今天大宋的祖宗，兴建的功业，犹如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陛下以德来继承，犹如武王、成王。而众臣的考查世次来论述，罗列在书册中，刻在金石上，用来通神明，明法式鉴戒的，缺而不想去做，这是学士大夫的过失。周代的德在文王、武王时为最盛，而《雅》、《颂》中称颂文王、武王的作品都在成王时期。如今用时间来考察它，那么，祖宗的神灵本来等待着陛下下来称颂。我诚然不自己估量估量，总是冒失地说它的大道理。至于按着类别选取相称的，原本幽隐的

使它显现出来，让它无不探究详悉，就有今天的文学之臣，充当在各个官位上，只要陛下所使用就是了。至于像周代的积累仁善，到成王、周公为最盛的时期，而《洞酌》篇中说皇天亲近有德的人，用酒肉款待有道的人，所以用来作为成王的鉴戒。大概走到极盛的势头上，而能用戒惧来惊动他的，是明的极点，智的尽头了。像能这样的，不是独有周代，唐尧虞舜是达到治的极点，他们的君臣还互相告诫说：“要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就有万种幾微的变化。”那么，处在最称治世的极点，用敬慎来保护它，是唐尧、虞舜所相同的。今天陛下踏着祖宗的基业，扩大着太平盛世的福，而且代代治平安定，是夏、商、周三代所不及的。那么，自从宋代兴起以来，全盛的时期就在今天。陛下抬头探索皇天所以亲近有德、宴飨有道的人的意思，而用恭敬、戒惧的心理来奉侍，低头思念一日二日就有万种幾微的变化的不可以不去详察，而处在兢兢业业的心理状态，使美好的光明与成果，日新年增，宏远高大，顺着走到无穷，到千万代永远有法则可依，这是陛下平素的蓄积所致。我愚笨，小小的爱君之心，诚然不自己掂量，想用近似诗人歌颂的意思了，只有陛下所选择。

议经费札子[1]

茅坤评曰：“名言。”

1 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[2]，使有九年之蓄。而制国用者，必于岁杪，盖量入而而出。国之所不可俭者，祭祀也。然不过用数之仞，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。盖用之有节，则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汉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尝屈矣，文帝、太宗能用财有节，故公私有馀，所谓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用之无节，则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汉唐之盛时，天下之用常裕矣，武帝、明皇不能节以制度，故公私耗竭，所谓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

2 宋兴，承五代之敝，六圣相继[3]，与民休息，故生齿既庶[4]，而财用有馀。且以景德、皇、治平校之[5]：景德户七百三十万，垦田一百七十万顷；皇祐户一千九十万，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；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，垦田四百三十万顷。天下岁入，皇祐、治平皆一亿万以上，岁费亦一亿万以上。景德官一万馀员，皇祐二万馀员，治平并幕职，州县官三千三百馀员，总二万四千员。景德郊费六百万，皇祐一千二百万，治平一千三百万。以二者校之，官之众一倍于景德，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。官之数不同如此，则皇祐、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。郊之费不同如此[6]，则皇祐、治平用财之端，多于景德也。诚诏有司按寻载籍，而讲求其故，使官之数、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，郊之费、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。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，可损者损之。使天下之入，如皇祐、治平之盛，而天下之用、官之数、效之费皆同于景德，二者所省者盖半矣。则又以类而推之，天下之费，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，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。如是而力行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，所省者十之一，则岁有馀财一万万。驯致不已，至于所省者十之三，则岁有馀财三万万。以三十年之通计之，当有馀财九亿万，可以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国家之富，未有及此也。古者言九年之蓄者，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，盖约而言之也。

3 今臣之所陈，亦约而言之。今其数不能尽同，然要其大致，必不远也。前世于雕敝之

时[7]，犹能易贫而为富。今吾以全盛之势，用财有节，其所省者一，则吾之一也，其所省者二，则吾之二也。前世之所难，吾之所易，可不论而知也。

4 伏惟陛下冲静质约，天性自然。乘輿器服，尚方所造[8]，未尝用一奇巧。嫔嬙左右[9]，掖廷之间，位号多阙。躬履节俭，为天下先。所以忧悯元元，更张庶事之意，诚至惻怛，格于上下。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，又非陛下之所难也。臣诚不自揆，敢献其区区之愚，惟陛下裁择[10]。

【注释】

[1] 札子：古代的公牍文，这里是指向皇帝进言的奏疏。 [2] 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：说见《礼记·王制》。 [3] 六圣：指宋代的六个皇帝，即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。 [4] 生齿：指人民。 [5] 景德：宋真宗第二个年号。 皇祐：宋仁宗第七个年号。 治平：宋英宗年号。 [6] 郊之费不同如此：这七字据集增补。 [7] 雕敝：同“凋敝”，衰败。 [8] 尚方：主管制作宫中所用手工制品的机构。 [9] 嫔嬙：宫中女官名。 [10] 裁择：集末有“取进止”三字。并在文末注明“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”字样。

【译文】

1 我听说古代用三十年来贯通计算国家的财政用途，使有九年的积蓄。而贯通计算国家财政用途的时间，一定在年末，大概是量入为出。国家所不可节约的，是祭祀了。然而不过用总数的零头，那么，先王管理财政的意思就可知道了。使用有节制，就是天下虽然贫困，它的富裕容易达到了。汉、唐的开始，天下的财政曾经枯竭了，汉文帝、唐太宗能够有节制地使用财政，所以国家、私人都有了结余，这就是所说的天下虽然贫困，它的富裕容易达到了。使用财政没有节制，那么，天下虽然富裕，它的贫困也容易达到了。像汉、唐兴盛时，天下的财政常常很充足，但汉武帝、唐明皇不能按制度来节约，所以国家、私人都把财产耗费完了，这就是所说的天下虽然富裕，它的贫困也容易达到了了。

2 宋代兴起，继承了五代的凋敝，六位圣主相继起来，和人民休养生息，所以人口已经增多，而财政用途还有结余。暂且用景德、皇祐、治平来比较：景德时有户口七百三十万，耕种的田地一百七十万顷；皇祐时有户口一千零九十万，耕种的田地二百二十五万顷；治平时有户口一千二百九十万，耕种的田地四百三十万顷。天下每年收入，皇祐、治平都在十万万以上，每年花费也在十万万以上。景德时的官员有一万多名，皇祐时有二万多名，治平时连同幕僚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名，总共二万四千名。景德时祭天地的费用六百万，皇祐时一千二百万，治平时一千三百万。用二者来比较，皇祐、治平时官的总数比景德多一倍，祭天地的费用也比景德多一倍。官员的数量是这样的不相同，那么，皇祐、治平时当官的门路多于景德了。祭天地的费用是这样的不相同，那么，皇祐、治平时用财的头绪多于景德了。诚然能下诏有关官府根据记载的簿册，而讲求造成这样的原因，使用官员的人数，当官的多种门路就可以考察得知，祭祀天地的费用，使用财产的多种头绪也就可以考察得知。然后各自议论它们中可以罢去的就罢去它，可以减少的就减少它。使天下的财政收入，像皇祐、治平时的众多，而天下的财政使用、官员的数目、祭祀天地的费用，都和景德时相同，这二方面所节省的大概有一半了。就再以此类推，天下的费用，有过去的节俭而今天浮华的，有今天的节俭而过去浮华的。浮华的一定要找到它所以浮华的原因而杜绝它，节俭的一定根据它所以节俭的原因而跟从它。像这样去努力做，以每年收入十万万以上来计算，所省的有十分之一，那么，每年有结余的财产一万万。逐渐达到这数字而不停止，直到

所节省的有十分之三，那么，每年有结余的财产三万万。用三十年来总算，应当有结余的财产十万万，可以成为十五年的积蓄。从古以来国家的富裕，没有到过这个数字的。古代说九年的积蓄，是计算每年的收入存十分之三罢了。大概是约略而说的。

3 如今我所陈述的，也是约略而说的。今天它的数字不能都相同，然而总括它的大致情形，一定离实际情况不远了。在前代衰败的时候，还能改变贫穷而成为富裕。今天我们以全盛的形势，使用财政有节制，所省的一，就是我们的一，所省的二，就是我们的二。前代所感到困难的，我们感到很容易，可以不说就知道了。

4 俯伏思念陛下淡泊宁静、质朴俭约，是自然的天性。所乘的车舆、用具、衣服，由尚方制造，没有使用一件奇巧的物品。皇宫中的嫔嫱左右侍从，妃嫔居住的地方，名位多有空缺。皇上亲身实践节俭，为天下的人走在前头。所以忧怜黎民百姓，改变众多政事的心意，诚然极为忧伤，感动上下。对于申明法度以管理天下的财政，又不是陛下所难于做到的了。我诚然不自己掂量，敢呈献我小小的愚见，只请陛下定选择。

请减五路城堡札子

茅坤评曰：“似亦名言。惜也，篇末措注亦欠发明。”

1 臣尝议今之兵，以谓西北之宜在择将帅，东南之备在益戍兵[1]。臣之妄意，盖谓西北之兵已多，东南之兵不足也。待罪三班[2]，修定陕西河东城堡之赏法[3]，因得考于载籍。盖秦凤、鄜延、泾原、环庆、并代五路，嘉祐之间[4]，城堡一百一十有二，熙宁二百一十有二[5]，元丰二百七十有四[6]。熙宁较于嘉祐为一倍，元丰较于嘉祐为再倍。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。虽故有之城，始籍在于三班者，或在此数，然以再倍言之，新立之城固多矣[7]。

2 夫将之于兵，犹弈之于棋。善弈者置棋虽疏，取数必多，得其要而已。故敌虽万变，涂虽百出，而形势足以相援，攻守足以相赴，所保者必其地也。非特如此，所应者又合其变，故用力少而得算多也。不善弈者，置棋虽密，取数必寡，不得其要而已。故敌有他变，涂有他出，而形势不得相援，攻守不能相赴，所保者非必其地也。非特如此，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，故用力多而得算少也。守边之臣，知其要者，所保者必其地，故立城不多，则兵不分，兵不分，则用士少，所应者又能合其变，故用力少而得算多，犹之善弈也。不得其要者，所保非必其地，故立城必多，立城多，则兵分，兵分则用士众，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，故用力多而得算少，犹之不善弈也。

3 昔张仁愿度河筑三受降城[8]，相去各四百馀里，首尾相应，由是朔方以安，减镇兵数万。此则能得其要，立城虽疏，所保者必其地也。仁愿之建三城，皆不为守备，曰：“寇至当并力出战，回顾望城，犹须斩之，何用守备？”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，可谓所应者合其变也。

4 今五路新立之城，十数岁中，至于再倍，则兵安得不分？士安得不众？殆疆场之吏，谋利害者不得其要也。以弈棋况之，则立城不必多。臣言不为无据也。以他路况之，则北边之备胡，以遵誓约之故，数十年间，不增一城一堡，而不患戍守之不足，则立城不必多，又已事之明验也。臣以此窃意城多则兵分，故谓西北之兵已多，而殆恐守边之臣，未有称其任者也。今守边之臣，遇陛下之明，常受成算以从事，又不敢不奉法令，幸可备驱策。然出万全之画，常诿于

上，人臣之于职，苟简而已，固非体理之所当然。况由其所保者未得其要，所应者未合其变，顾使西北之兵独多，而东南不足。

5 在陛下之时，方欲事无不当其理，官无不称其任，则因其旧而不变，必非圣意之所取也。夫公选天下之材，而属之以三军之任，以陛下之明，圣虑之绪馀，足以周此。臣历观世主，知人善任使，未有如宋兴太祖之用将英伟特出者也。故能拨唐季、五代数百年之乱，使天下大定，四夷轨道，可谓千岁以来不世出之盛美，非常材之君、拘牵常见者之所能及也。以陛下之聪明睿圣，有非常之大略，同符太祖。则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乱，莫如太祖；能继太祖之志以经武，莫如陛下。臣诚不自揆，得太祖任将之一二，窃尝见于斯文，敢缮写以献。万分之一，或有以上当天心，使西北守边之臣，用众少而得筹多，不益兵而东南之备足，有助圣虑之纤芥，以终臣前日之议，惟陛下之所裁择[9]。

【注释】

[1] “臣尝议今之兵”三句：所议见《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》一文。本文即为该文的补篇，故文末曰“以终臣前日之议”。[2] 待罪三班：曾巩于元丰三年（公元1080年）徙知沧州，过京城，留任勾当三班院。待罪：臣下奏事时的自谦之词，意谓身居其职而力不胜任，必将获罪。三班：指三班院，是掌武官三班使臣选注升赏的机构。[3] 陕西河东：指陕西路、河东路，宋代路名，属一级行政区划。[4] 嘉祐：宋仁宗年号。[5] 熙宁：宋神宗第一个年号。[6] 元丰：宋神宗第二个年号。集作“元丰二年”。

[7] 茅坤于此处有批语云：“按奕之布子，譬国家之列兵，最明切。”[8] 张仁愿：唐下邦（今陕西渭南）人。有文武才。神龙中为洛州长史。为朔方总管时，请乘虚取漠南地，并筑三受降城，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。累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韩国公。[9] 据集，本文后尚有一段“贴黄”，即用黄纸另写的一段说明文字，附于正文之后。今抄录如下：“贴黄：五路城堡，据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数目如此。窃恐系旧来城堡，自来属枢密院差遣，后来逐度方降到窠名，系三班院差人，所以逐度数目加多。若虽是旧来城堡，即五路二百七十馀城，亦是立城太多。”

【译文】

1 我曾经议论当今的军事，认为西北适宜的是在选择将帅，东南的防备在于增加驻防的士兵。我的胡乱的想法，是说西北的兵已经多了，而东南的兵不够。等到我供职三班院，修订陕西、河东两路城堡的奖励办法，因而得以考察记载的簿册。大概秦凤、鄜延、泾原、环庆、并代五路，在嘉祐年间，有城堡一百十二，熙宁时有二百十二，元丰时有二百七十四。熙宁比嘉祐增加了一倍，元丰比嘉祐又增加了一倍。而熙河的城堡又有三十一座。虽然是原有的城堡，才登录在三班院，或者已包括在总数中，然而以再倍来说，新立的城堡本来就多了。

2 将的对于兵，犹如下棋的棋子。善于下棋的放置的棋子虽然稀疏，但所取的筹码数一定多，是得到下棋的要领罢了。所以敌方虽然有万种变化，路虽然有百条，而我方的形势足以互相援助，攻守足以互相奔赴，所能保护的一定是自己的地盘了。非但这样，所应付的又能配合它的变化，所以用的兵力少而得到的筹码多。不善于下棋的人，放置的棋子虽然很稠密，但得到的筹码数一定少，是没有得到下棋的要领罢了。所以敌人有别的变化，道路有别处杀出，而自己的形势不能够互相援助，攻守不能够互相奔赴，所保的不一定是自己的地盘了。非但这样，所应付的又不能够配合它的变化，所以用的兵力多而得到的筹码少了。守卫边疆的臣下，知道守边的要领的，所保的一定是自己的地方，所以设置的城堡不多，兵力就不分散，兵力不分散，用的战士就少，所应付的又能配合他的变化，所以用力少而得到的筹码多，好像是善于下棋的人了。不得守边的要领，所保护的不一定是自己的地方，所以设置的城堡一定多，设置的城堡多，兵力就分